

批判修正主义的文艺观

胡 采 著

东风文艺出版社

出版說明

胡采同志的这七篇文章，写于1957年至1958年間。这是作者反击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批判修正主义思想，保卫文艺的党性原则的论文集。在这本论文集里，作者主要针对陕西地区文艺界右派分子的种种反党谬论，作了深刻的分析和有力的批驳。为了帮助读者学习党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方针，把这些文章汇集出版，我们以为是有意义的。

东风文艺出版社编辑部

1959年3月

目 录

駁朱宝昌	(1)
溫故而更加知新	(28)
根本的分歧	(33)
保卫列宁的文学党性原則	(54)
批判修正主义的文艺观	(66)
——王愚宣揚了什么样的“新穎”理論?	
社会主义文学是真正自由的文学	(105)
根本問題在于思想改造	(111)

駁 朱 宝 昌

“延河”七月号发表的朱宝昌所写“杂文、諷刺和风趣”一文，是一篇站在资产阶级右派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立場上，向党向社会主义进行恶毒的污蔑和攻击的文章。其中論点，是极为反动的。

朱宝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想立場，集中表现在他給自己规定的—个极端反动的前提上，这就是：他首先肯定社会主义有黑暗，共产党有黑暗，毛泽东时代有黑暗。把黑暗（不是指缺点和某些錯誤，而是黑暗）和社会主义、和共产党、和毛泽东时代結合起来、混淆起来，这是朱宝昌一系列反动論点的出发点。既然，社会主义、共产党和毛泽东时代有黑暗，那么就應該反对，就要給以“尖刻辛辣的諷刺”。朱宝昌实际上是以反对所謂“黑暗”为盾牌，而发出了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反对毛泽东时代的一系列的反动謬論。

从許多事实証明：文艺界每次出現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謬論，总是通过許多具体問題以及对这些問題的看法而表現出来。对杂文的認識，对“魯迅时代”精神的認識，也

是这許多問題之一。朱宝昌的問題，他对于許多根本性質問題的論断和見解，也就是从討論雜文开始的。

朱宝昌首先反对了一种論点，这种論点說：新社会、社会主义社会、人民内部不需要諷刺，不需要雜文。我們說：如果簡單的、不加分析的、籠統地說新社会、社会主义社会、人民内部不需要諷刺，不需要雜文，这当然是不妥当的。但是，如果不分对象、不分敌我，甚至以我为敌，把諷刺和雜文乱用，把当年鲁迅先生用来反对国民党、帝国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的战斗精神和文章笔法，拿来在新社会、在社会主义社会、在人民内部乱用，拿来攻击共产党和革命的人民，这就不仅是錯誤的，而且是反动的。

朱宝昌紧接着又反对了另外一种論点，这种論点說：因为消灭帝国主义存在，所以雜文也应该存在。朱宝昌問道：有朝美帝国主义不存在了，难道雜文从此也就要进坟墓去了嗎？我們說：如果把雜文諷刺的对象，仅仅规定为美帝国主义者，这当然有些狹窄，不夠全面；但是，我們如果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場上，并决心为社会主义的事业奋斗到底，那么，我們就必须承认：一切文艺武器，其中也包括雜文，主要的战斗鋒芒，应该放在我們最主要最頑强的敌人方面，这就是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侵略集团，以及它們的徒子徒孙、它們在新中国内部的代理人和爪牙。就我們国内的当前形势來說，雜文諷刺和打击的对象，主要应该放在右派分子和一切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分子們身

上。至于在社会主义内部、在人民内部，所存在的缺点和錯誤，当然也要批判，对于某些阻碍社会主义历史车轮前进的消极思想和消极人物，也可以进行諷刺。但是，無論批判也好，諷刺也好，对社会主义人民内部和对敌人、对反动派、对帝国主义及其爪牙，是根本不同的，是有原則区别的，是不能乱用的。对不同的人所使用的批判或諷刺，性質是不一样的。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談会上的講話”中，一再指示我們：諷刺有几种，“必須廢除諷刺的乱用”，就是这个意思。毛主席說：

“如果把同志当作敌人来对待，就是使自己站在敌人的立場上去了。我們是否廢除諷刺？不是的，諷刺是永远需要的。但是有几种諷刺：有对付敌人的，有对付同盟者的，有对付自己队伍的，态度各有不同。我們并不一般地反对諷刺，但是必須廢除諷刺的乱用。”

毛主席在这里所一再教导我們的，是分清敌我問題，是分清敌我关系和敌我矛盾問題，警告我們不要把自己人把同志当作敌人来对待。朱宝昌最根本的問題是在于：他是完全站在敌对階級的立場上，来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反对毛澤东时代的。

下面，讓我們逐一来研究朱宝昌的許多具体的論点。

二

先談他的几个帶总論性的观点。

朱宝昌說：“在任何时代，杂文都是反抗黑暗的先驅。”为了支持他这个論点，他別有用心地把魯迅先生抬出来，給他撑腰。言外之意就是，誰若是反对他的論点，誰似乎就是反对魯迅先生一样。

朱宝昌这样做，不仅是对魯迅精神的极大歪曲，而且对于伟大的人民战士和共产主义战士的魯迅，是一种侮辱。

把魯迅生活的年代，作为一种特定的时代特征来看，主要是：一方面，国内反动势力勾結国际帝国主义，残酷地压榨和奴役中国人民，把中国拉向更加黑暗和倒退，想使中国永远墮落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地位；另一方面，中国人民、中国工人阶级和一切进步力量，在共产党领导下，为爭取祖国的新生和解放，为爭取人类幸福的前途，向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以及一切在中国的反动势力，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在这种斗争中，魯迅始終站在人民方面，站在工人阶级方面，站在共产党方面，以文艺为武器，并利用了杂文这一特別鋒利的武器，向反动派开火。魯迅歌頌苏联，歌頌中国共产党和全中国人民所进行的斗争。魯迅即便在他生活的那个年代，就是說在反动派統治下的黑暗年代，魯迅也歌頌了人民斗争所代表的光明面。魯迅从来没有把他战斗的鋒芒，把攻击的对象，放在人民和革命方面，如毛主席所說的：“如果不是对于人民的敌人，而是对于人民自己，那末，‘杂文时代’的

魯迅，也不會嘲笑和攻擊革命人民和革命政黨，雜文的寫法也和對於敵人的完全兩樣。”

魯迅，魯迅的道路，不會給朱寶昌的反動論點以任何支持，相反，倒是徹底擊碎了它。魯迅戰鬥的一生，完全是為了中國人民的幸福和解放，為了爭取今天我們所生活的這個社會主義社會前途。

朱寶昌說“在任何時代，雜文都是反抗黑暗的先驅”。這個“任何時代”，是意味深長的。說在封建統治時代，或半封建半殖民地時代，即國民黨反動派統治時代，雜文是反抗黑暗的先驅，這沒問題，因為魯迅先生以及我們的其他前輩先生們，早就這樣作了。而朱寶昌的意思不在這裡。他所以着重提出“任何”“任何時代”來，主要的意思是說：即使在社會主義時代和社會主義社會裡面，雜文也是反抗黑暗的先驅。把黑暗和社會主義連系起來，這在朱寶昌是一個根本性的前提。

每一個愛社會主義的正直的新中國公民，都會看到並且相信：我們趕走了帝國主義，推翻了反動派，基本上消滅了階級剝削，開始建設了社會主義，我們這個社會是這樣充滿了光明和陽光，並有無限光輝遠大的發展前途。目前，我們的社會生活中，雖也還存在不少缺點甚至錯誤，但是，我們是能夠克服它們的。很顯然，只有站在反動階級立場上的人，才會說得出社會主義社會黑暗這種別有用心的話來。

朱宝昌說：“至于毛泽东时代的光明的一面，那是难于讚叹的！也惟有正直的公民，忠心于共和国的公民，看見黑暗一面的眼睛才看得見。”我以为，朱宝昌在这里，是在耍花枪、摆迷魂陣，以誘使讀者上他的圈套。如我們在前面所說：社会主义、毛泽东时代的新中国里面，虽有缺点和錯誤，但这决不是什么黑暗。他所說的看見黑暗一面的眼睛才看得見光明这个論点，是个理論問題，又不是个理論問題。从理論这个角度来观察，朱宝昌的这个論点是极为荒謬的。正常的人，总是首先看見光明，响往光明，喜爱和热中于光明，只有能追求光明热爱光明，并充分估計我們社会中的成績的人，他才可能正确地估計我們工作中的某些錯誤和缺点，正确認識目前我們社会生活中的某些事物的阴暗面。一个不能首先看見光明并对光明和工作成績作出正确肯定評價的人，不可能正确認識什么是缺点錯誤以及缺点錯誤的性質和深淺大小。一个总是看缺点錯誤，看某些事情的消极因素，而看不見我們的生活主流，看不見社会主义建設的大动脉汹涌前进的人，他必将失去追求光明、为光明奋斗的信心与决心，并将被革命的洪流所抛弃。朱宝昌的論調，实际上是引导人走向不看光明、背离光明而專找所謂“黑暗”的錯誤道路上去。至于說朱宝昌的这个論点，不是理論問題，是因为他本人的主要意图，不在于闡明某种理論，而是在煽动和挑拨人向毛泽东时代、向社会主义寻找黑暗，并荒謬地說：只有能寻

找黑暗、看得見黑暗的人，才是“正直的公民”，才是“忠心于共和国的公民”。

朱宝昌說：“我以为有光明就歌頌光明，有黑暗就揭露黑暗。”表面看起来，似乎朱宝昌这句话是很公道，很实事求是的。其实不然。他所說的“有光明就歌頌光明”，是一句衬話，是一句挡箭牌，他的本意是在下面这句话，即“有黑暗就揭露黑暗”。为什么要这样說呢？这从他銜接在前面的文字中，可以看出来。朱宝昌写道：“据我的那位领导說：自从共和国成立以来，揭露黑暗的諷刺文学用不着了，应该代之以歌頌光明的文学。”下面紧接着朱宝昌又讲了如下的話：“我无法同意我这位领导的意見。我以为有光明就歌頌光明，有黑暗就揭露黑暗。”他的反对歌頌光明，而意在揭露所謂黑暗，十分了然。

毛主席教导我們：革命的文艺家，必須歌頌革命，歌頌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歌頌革命的胜利。毛主席批判了那种认为“写光明与黑暗并重，一半对一半”的糊涂观念。而在朱宝昌这里，他的真正意图，是連“一半对一半”都不是的。

朱宝昌說：“对于歌頌光明和揭露黑暗的人，不必，也不可能要求其全面。只問他所歌頌和揭露的是不是真实的，通过了他自己的感情沒有。”首先，关于歌頌光明与揭露黑暗問題的關鍵、問題的实质，不是“要求全面”与否的問題。而首先是你愿意歌頌光明与否的問題，歌頌什

么光明的問題，揭露什么黑暗、向什么人和向誰揭露黑暗的問題。地主、資產階級就不愿意歌頌社会主义社会的光明。工人、农民、一切爱国、爱社会主义的人士，大都歌頌社会主义的光明，右派分子就反对。鲁迅热爱苏联，帝国主义就想打倒苏联。一切爱社会主义中国的詩人，都写歌頌新中国的詩篇，而流沙河就写“草木篇”，张賢亮就写“大风歌”。鲁迅揭露国民党反动派、揭露資產階級的黑暗，而梁实秋和第三种人們就反对。一切革命人民都說“肃反工作很重要，成績巨大”，而反革命分子和同情反革命分子的人說：“肃反搞糟了”。一切爱社会主义新中国的人說：黑暗，要到帝国主义、反动派、右派分子那里去找，要到一切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分子那里去找，而站在反动階級立場上的人却說：應該到社会主义制度、到共产党里面去找。一切等等。这說明了什么問題呢？很清楚：关于歌頌光明与揭露黑暗的問題，首要的和关键性的問題，是立場問題，是你站在什么立場上，用什么思想观点去看待光明和黑暗的問題，是你对歌頌与揭露的对象，抱什么态度的問題。在这里，立場、观点和态度問題，是本性的問題。

其次，朱宝昌所說的歌頌和揭露的“真实”性問題，“感情”問題，也很有意思，可以說和他前面的論点是一脉相承。地主階級反对土改，仇恨分了他们的土地的农民，仇恨新社会和共产党，这不但是真实的，而且地主的仇恨

之情，也完全可以說是“通過了他自己的感情”的。流沙河對新社會的人和事，充滿了仇恨的真情，他的“草木篇”，毫無疑問應該說是一篇“通過了他自己的感情”的作品。張賢亮仇視社會主義社會的真情，也是“通過了他自己的感情”，深沉地流露在“大風歌”中。反過來，解放後的農民詩人，歌頌翻身，歌頌反霸；工人中的文艺作者歌頌自己當了新社會的主人；這一切不但是真實的，而且也是“通過了自己的感情”的。黃繼光、董存瑞等，出於對革命對祖國對人民無限忠誠的愛，出於對人民仇敵的不共戴天的恨，他們甚至以自己年青可貴的生命，以犧牲的代價，以鮮血，去創造革命戰爭勝利的詩篇，毫無疑義，他們更加是“通過了自己的感情”的。所有這一切，怎樣理解呢？難道：地主階級、“草木篇”、“大風歌”和翻身的工人、農民、黃繼光、董存瑞等，他們的仇恨和愛憎，不都是很真實的嗎？不都是“通過了自己的感情”嗎？為什麼會是這樣相反，有這樣根本性質的不同呢？原來，這也不是什麼秘密，沒有什麼奇怪的。人們的階級立場不同，思想觀點不同，是決定人們原則分歧的最根本的東西。

有些人總是喜歡談“真實”性，不談立場觀點，並且每每企圖以所謂“真實”性，來掩蓋和混淆立場觀點的不同。其實，這是掩蓋不了也混淆不了的。有各種各樣的“真實”，有資產階級所說的和偽造的所謂“真實”，也

有工人階級所說的真實。社會主義者承認我們社會中有缺點，而右派分子却說：那不是缺點，那是黑暗。社會主義者說：我們的缺點是可以克服的；社會主義制度確比資本主義制度優越。而右派分子則說：在社會主義制度下面，既然有“黑暗”，這就證明社會主義制度不行了。在這種情況下，到底那種說法“真實”，那種說法代表真理呢？事實證明：社會主義者的說法代表真理，因為這種說法反映了我們社會的真實情況。但是，為什麼右派分子看不到這種真實、這種真理呢？这里面就有立場問題，因為右派分子是站在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立場上，故意誣蔑攻擊社會主義、故意謾罵和攻擊領導人民建設社會主義的共產黨。右派分子在向黨向社會主義進攻中，造謠生事，有意挑撥，把是說成非，把毒草說成香花，顛倒黑白，無中生有。然而就是這樣，他們還給自己掛上“真實”的招牌。其意在欺騙，阻撓建國。

單提所謂“真實”性，是不能揭示出問題的本質的。我們要的是站在工人階級立場和用社會主義觀點所透視的真實，要的是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指導所分析的真實。

朱寶昌把他所說的“有光明就歌頌光明，有黑暗就揭露黑暗”的文學，說成是“為了使社會更進步，使人民的生活更美好。”至於這種文學到底是什麼？他沒明說。他說：“這叫什麼主義的文學呢？我不懂，我也懶得管。”字里行間流露出，朱寶昌是很討厭主義和“什麼主義的文

学”的。在当前这个世界里面，是有不少主义，而有些主义是应该讨厌并且应该打倒的。比如：帝国主义、资本主义、侵略主义、世界主义等等。但也有另外一些主义，人民是不但拥护，并且为它奋斗到底。比如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文学创作方面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等等。在现在这个世界上，不要主义是不行的。没有主义，就没有奋斗方向，工作生活上就无所遵循。中心的问题：是什么主义，是好主义还是坏主义，是革命主义还是反革命主义。朱宝昌讨厌主义，是讨厌什么主义呢？是指的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吗？不象。他所說的“什么主义的文学”，是指的“世界主义”的文学吗？也不象。因为所有这些主义，在目前我们这个社会中，并不合法，也没有大量市场，如果他真的是反对这些主义，他完全可以明确指出来，用不着那样隐晦，那样吞吞吐吐。那么，朱宝昌到底讨厌的是什么主义呢？他为什么要这样隐晦呢？说到这里，我不禁想起胡适来，胡适当年是曾经劝人們“少谈点主义，多研究点学问”的。那时，胡适劝人們少談的“主义”，是指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是指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以胡适为代表的中国买办资产阶级，对共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是恨之入骨的。他們讨厌和污蔑这些主义是不足为奇的。现在，朱宝昌也讨厌和反对起主义来了。他所讨厌和反对的，到底是什么主义，虽然没有明說，但从他的一系列論点的性質来看，是并不难明白的。而且，朱宝昌把他以

上的思想見解稍一發展，他就給自己提出了明確的主張：

“先有文學而後有主義，不是先有主義而後有文學。”

社會主義作家、工人階級作家，所寫的文學作品，就自然而然地、直接地或間接地反映了他的思想觀點，並體現了社會主義和工人階級的最高的利益和最根本的精神。資產階級或者封建主義的作家，寫的作品，也就必然或輕或重或直接或隱晦地反映出他所代表的階級利益和思想影響。因此，把文學和主義和政治分開，對立着提出來，是混亂的和糊塗的。但是，我以為：朱寶昌在這裡所提出的問題，不是因為糊塗，他是很清楚的，他是有所為的。我們認為：在我們這個社會時代的人民，都不能不談社會主義，都不能不談毛主席的六項政治標準，我們不能不為建設美好的社會主義，而付出自己艱苦的勞動。這是因為我們深信：只有社會主義，只有走社會主義的路，才會給我們帶來幸福的生活。在文學創作上，我們也不能不多談社會主義現實主義，這也因為我們相信：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比文學上的其他主義，更好些，更進步些，我們如果對社會主義現實主義運用得好，創作收穫就會更大，而文學作品更能反映這個時代的真實，也更能有力地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我們這樣說，也這樣相信，並且這樣努力實踐。事實證明，我們這種看法和作法是正確的。但是，朱寶昌卻宣傳“懶得管”所謂主義，他並且說他這樣做，是“為了使社會更進步，使人民的生活更美好”，是為了

“让文学的花园里繁荣起来”。人們不禁要問：他所說的“更进步”，是进步到那里去？不談社会主义而能使人民的生活更美好，这是那一种人的生活美好？在文学的花园里，他到底希望繁荣些什么东西？

我以为：人們提出这样的問題，是很有道理的。

朱宝昌說：“任何人都有崇高的一面，也都有向下的一面，都有自我牺牲的精神，也都有自私自利的根性。”朱宝昌在他論断的前头，特別提出“任何人”，他的用意是很恶毒的。这就是說：馬克思、恩格斯、列宁以及所有伟大共产主义的战士，都有兩面性。不仅如此，杜魯門、杜勒斯、蔣介石、李承晚以及一切大資本家反动派头子，都有兩面性。不論任何人，都有崇高的一面，自我牺牲的一面，也有卑下、自私自利的一面。工人階級、共产主义者和資产階級、資本家唯利是圖分子，都是一丘之貉，沒有本質的不同。其实，朱宝昌这种論点，是并不孤单的，章乃器不也是这样主張嗎？

我們說，未經彻底改造、思想立場尚未根本轉变过来的小資产階級知識分子，有兩面性，是說他們有要求革命向上的一面，有接受共产党领导并能夠接受改造的一面，也有消极的向下的一面，即原来的階級影响并易于在革命斗争中动摇的一面。对于这类人，我們是帮助他們克服落后面，巩固与发展进步的一面。事实証明，我們这种作法，对絕大多数人來說是行之有效的。但是，不能把这种

看法和作法，到处乱用乱套。乱用乱套，不仅会造成混乱，而且会造成錯誤。一切伟大的共产主义者，一切为争取人类幸福生活而流血奋斗，甚至付出了自己宝贵生命的共产主义战士，都不能说什么兩面性，这样說对他们是最大的侮辱。他们是忠心耿耿的一心一意的为人民事业、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不息的一条心或一面性。而杜魯門、杜勒斯、蔣介石、李承晚之流，以及一切大资产阶级反动派头子，就只有反人民反革命的一面，就只有无耻、卑鄙、残忍和极端自私自利的一面。

在这里，朱宝昌所以提出任何人都有一面性，其实，他是另有用意的。他的用意是：你什么共产党，你什么无产阶级，不要吹牛吧，你们和别人都只不过是半斤八兩，有什么权利总是說改造人家。当然，还不仅如此，朱宝昌所以这样說，他是想制造一种輿論，一种借口，以便掩护他进一步攻击新社会，攻击共产党、特别是党员领导同志。

关于这一部分問題，我們想留在文章的下一部分，着重談談。

三

以上，我們約略檢閱了作为朱宝昌反动謬論的所謂理論基础或理論根据。以下，我們想单独談談他对于党的领导对于我們社会主义的認識。当我们一开始较为深入地接触到这一部分时，我們就更加能够領悟到前面所談的那